儒商童珮

◎余金土

童珮,字子鸣,生于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卒于万历四年(1576年),龙游县澗水乡桐冈坞村(今塔石镇童岗坞村)人。童岗坞村的童氏家族于南宋末年迁入寿昌杜田村,为避战乱,童珍四于元朝初年迁到童岗坞村。该村围绕东山岗而建,多数房子坐北朝南,东、北面有黄山尖和杜山峰。杜山峰因唐朝杜如晦隐居于此而得名,峰前有一支水源流向童岗坞村门前,村中有大东山岗,因山岗上长满了桐树,故得名“桐冈”,因“桐”“童”谐音,故村名衍为童岗坞村,至今约有600余年的历史。童珮生活的年代,正是龙游商帮的鼎盛期,家族中经商之风很盛。据《桐冈童氏宗谱》记载,童珮父亲童彦清是书商,童珮自幼就随父亲贩书于苏州、杭州、常州、无锡等地,父亲去世继承父业贩书。童珮因贩书而读书,因读书而藏书、编书,所作诗文汇编成集刊行于世,是龙游商帮中典型的一代儒商。

童珮幼时“家贫,不能从塾师”(王世贞《童子鸣传》),但职业使他长期受到书的浸润,“日与之居,其性灵必有能自开发者”(归有光《送童子鸣序》)。童珮勤奋,“喜读书……日夜不辍,历岁久,流览既富”,终于学有所成,不但能够写诗作文,而且“尤善于考证书画金石”(民国《龙游县志·童珮传》)。

学养既丰,也就有了和文人学士打交道的本钱和共同语言,当时和童珮关系密切的知名文人有:

人称“震川先生”的昆山人归有光(1507—1571年),是著名的散文大家和文学宗师。童珮想投他门下求学,归有光《送童子鸣序》文中提及“子鸣依依于余,有问学之意”。在批评当时读书人“内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临人之术,纷纷然日竞于荣利”的现象后,归有光又对童珮“鬻古人之书……今欲求古书之义”的不求荣利、一心向学的行为深表赞赏。

名列文学史“后七子”的太仓人王世贞(1526—1590年),居当时文坛魁首之地位,又官至刑部主事之职。在所写诗中,他把童珮

的为人概括为“隐能逃小贾,穷不废长吟”。童珮死后,又作诗表达那“泪向吴江尽,恩偏越峤深。山阳夜中笛,肠断不堪寻”的悲痛,可谓情深谊重。

文学家苏州人王穉登(1535—1612年),曾为童珮所编《徐侍郎集》作序,童珮去世后又主持了《童子鸣集》的编印,在序文中对其学习的刻苦和谦虚诚实的品格赞叹不已。

文学家兰溪人胡应麟(1551—1602年),和童珮交谊最深。胡应麟是个不入仕途专以著述为乐之人,与童珮意气相投。胡应麟在童珮悼亡诗中写道:“海岳谁高蹈,丘园有独醒。下帷头自白,避俗眼常青”,这是写童珮的不随世俗;“向来携手地,凄绝子期弦”,这是抒发对童珮去世的悲痛之情。二人情谊极深。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的衢州知府韩邦宪。韩邦宪做官前,曾在旅舍中偶遇童珮,两人因谈得投机而成为朋友。任知府后,韩曾专程赴龙游北乡访童珮,两人吟诗相和“至夕始去”。当时韩邦宪很想为童珮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却被童珮以“甘田中食,不忧馁”婉谢。后来韩邦宪在任上病逝,童珮徒步为其送丧。

在中国藏书史上,童珮也有一席之地。在吴晗所著《两浙藏书史略》一书中就有关于童珮的记载,《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一书对他有这样的评论:“龙游童珮不仅藏书,还刻书,在浙江藏书史和出版史上都应有地位。”童珮“藏书数万卷,皆手自雠校”(民国《龙游县志》),家产却仅“薄田数十亩”。在贩书过程中,童珮每遇善本便藏之不售,因此所藏多善本。胡应麟曾见过他的藏书目录,并兴奋地说:“得足下藏书目阅之,所牖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令人手舞足蹈。”可见其藏书数量与质量的颇有可观。

童珮生平编过两部书:一是曾任盈川县令杨炯的《杨盈川集》。杨炯位列“初唐四杰”,其文集到明朝时已无存,经童珮从各种旧籍中搜辑,共得诗赋四十二首,序表碑铭志状杂文二十九篇,他将之编为十卷。一是《徐侍郎集》。徐侍郎即徐安贞,唐玄宗时曾掌管制作

诏书,后授工部侍郎、中书侍郎,深得玄宗赏识。“帝属文多令视草”,《新唐书》《全唐诗》收录其诗11首。童珮还和曾任临武知县的龙游人余湘合纂万历丙子《龙游县志》十卷,发起建龙丘祠以纪念乡贤龙丘苒。童珮对传承地方文化功不可没。

童珮死后,人们把他的遗文编成《童子鸣集》六卷,其中诗四卷、文二卷,王穉登作序。文集被《续文献通考》所著录,也为《四库全书》存目。《四库提要》说童珮写作:“闭户属草,必屡易而后出,出则使人弹射其疵,往往未惬,并其稿削之不留一字。”

童氏族人素有诚信经商的优良传统,童珮父亲童彦清就被王世贞誉为“不寝然诺”,是个讲信用的人,而他的伯父童庆“为人峭直无私,不妄贪利,不循枉道”,是个恪守商业道德的人,叔父童富则乐善好施,“损人便己之事,虽小不为;济困扶危之举,虽费不惜”,族兄童巨川享有“居心正直”之誉,童洋被评为“家风为一时之最”。

据王世贞《童子鸣传》,童珮贩书的一个重要地方是梁溪(今无锡),“梁溪诸公子心慕之,争欲得子鸣一顾以重”,童珮对这些公子哥儿们也“时有所过从”,这自然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但他与人交往自有考量。当时皇家宗室朱忠僖和其兄恭靖王想请他来评鉴家藏的字画,设法请和童珮要好的人把他“挟之都”,但童珮到他们家后“焚香啜茗评鹭字画而已,不复言及外事”。兄弟二人想把子鸣留下来做门客,然而童珮“一夕竟遁去”,不辞而别,显示了他的儒商风采和书生本色。

童珮以贩书为生,却能成为颇有影响的藏书家,并以文名为士林所重,实属不易。他从商人中脱胎而出,以文人身份和读书人交往,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清白的操守,正确处理“利”和“义”的关系,对现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来讲也有有益的启迪。

石佛胡氏奇人奇事

◎徐光海

几个小伙伴在本村一位拨贡家中玩耍。玩得正欢时,一个少年手中的木棒不小心碰到了茶几上的一只白瓷茶杯,“叭”的一声,茶杯掉落在地,碎成几片。小伙伴们四处逃散,那闯祸的少年吓呆了,怔怔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见心爱的茶杯被打碎,拨贡恼怒,当众嘲讽那少年:你这穷小子长大了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谁知那少年长大后却很有出息,他便是石佛胡氏宗族第十三代先祖胡琨。

胡琨,出生于清代康熙十四年(1674年)。虽出身寒门,又年幼丧父,但他自强不息,稍长即独自外出闯荡,刻苦学艺,康熙三十六年科试中武进士第三名,即“武探花”,被封为直隶省正定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副将,后晋升为渝州(重庆)总兵。胡琨勤政廉明,政绩斐然,深得朝廷和皇上的器重。康熙皇帝念胡琨功绩不凡,下旨命工部在其故乡龙游石佛兴建了一座前后三进、面积446平方米的探花厅,并御笔亲书“探花及第”四字,匾额悬挂于探花厅大门之上。如今,这座具有320多年历史的建筑已

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琨则成为石佛胡氏家族子孙后代的励志榜样。

石佛,旧名石峰,因距其不到一公里的上余“余龙寺”被烧毁后,有一僧背着该寺一尊石雕佛像来村而改名石佛,也有一说是村南面的一座山因形似坐佛而改名石佛。胡姓成为石佛村的第一大姓,与居住在西金源村黄塘源的胡氏先祖有关。相传,黄塘源胡氏先祖中有一位以卖笠帽为生。一天,他挑着一担笠帽去外村售卖,在石佛村北面长后山一棵古樟树底休息时,头上戴的一顶笠帽被突然刮来的一阵风吹落在地。他拣回笠帽重新戴到头上,挑上担没走几步路,笠帽又被风吹走,不偏不倚又落在原先掉落的地方。胡氏先祖心想,莫非此地想收留我?胡氏先祖为防笠帽被风吹落,就将头戴的笠帽用绳系于脖子下方,然后又上路去卖笠帽。在返回黄塘源经过古樟树底下时,一阵风吹来,他头上戴的笠帽又被吹落,笠帽滚来滚去还是停在前两次停落的位置。回到家,胡氏先祖和本族长辈讲

述了当日发生的怪事,长辈们都说他与石佛有缘。于是,这位卖笠帽的胡氏先祖携家人卜居石佛,后开枝散叶渐成村落。

旧时,有村就有庙。今年76岁的吴守权居住在石佛村黄龙路,其住宅于2012年4月17日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小学文化程度的吴大爷在劳作之余喜欢看些文史类书籍,他在一本硬皮笔记本上记下十数则民俗、村史资料。据他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石佛村有四五座殿宇,其中最大的一座殿为位于村南面的文昌殿。历史上每年农历三月初四文昌殿庙会,四邻八方的村民赶来逛庙会、购物品,十分热闹。文昌殿已于1958年拆除,至今仍保留的石佛村每年农历三月初四物资交流会就源于文昌殿庙会。在龙游北乡泽随、石佛一带有“前江的锣,泽随的炮,石佛的120个石灰灶”的说法,说的是石佛村南面山上的石灰石原料好,烧出的石灰质量好,从事石灰行业的村民多,而“泽随的炮”则说是用于喜庆时燃放的威力巨大的一

种炮仗。早时,龙游县城的石灰商行老板都喜欢产自石佛的石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灰除用于建房之外,也用于田间作物的杀菌治虫、改良土壤,用量较大。随着煤灰、水泥、农药、化肥的出现,石佛的石灰灶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吴大爷说,村中有一座小庙,位于村东北面石塔头的岭脚,村民习惯称之为“石塔头小殿”。此庙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老吴说他小时候见过小庙,内供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等神像。庙虽小,却很神奇,在洪水频发的年代,附近田地的庄稼常被淹没,而小庙却总是安然无恙,于是引来众多香客,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日进庙祭拜者众多,香火旺盛。其实,这跟建庙的位置有关:小庙的西面有一条自北向南的小溪流,南面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小溪流,东面原有一大片溪滩,两条小溪流的水汇合后便迅速分流到溪滩,如此小庙便避免被洪水所侵袭。该小庙历经几次毁建,现今已被正式批准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取名“黄龙庙”。